

建筑实践中民族风格与现代建筑关系的探索

——以三位大师为例

李丹 刘家伟华

(华商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 100071)

【摘要】 本文主要讨论了民族风格与现代建筑这一议题。在中国现代建筑起步阶段的特定时代背景下, 从建筑创作理念、建筑实践作品、建筑理论成就出发, 对中国第一代建筑大师中的吕彦直、杨廷宝、梁思成进行了研究与比较。通过建筑实例探讨了大师们在建筑设计中对民族风格与现代建筑关系的处理方式, 并结合当下的建筑设计环境, 对我国建筑师使命的议题做了讨论。

【关键词】 民族风格; 现代建筑; 建筑实践; 建筑史

在后现代和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全球的建筑实践进入“大趋同”时代, 即在不同国家、不同气候、不同文化背景的城市中出现了设计风格类似的建筑, 对各国的建筑设计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 深刻理解如何持续推进拥有我国特色的建筑设计实践与理论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文化自信的要求, 也是城市建设的需要。

吕彦直、杨廷宝、梁思成是同属于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三位大家。三位先生留学所接受的都是现代建筑教育体系, 回国后面都经历着中国现代建筑的起步阶段, 在建筑设计实践与相关学术研究所要解决的都是当时社会现实与中国传统建筑的矛盾, 在推进现代建筑教育的事业中都面对着如何在当时的背景下进行“中国建筑的设计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问题。深入研究三位先生在现代建筑中探索民族风格的开拓过程, 对解决当下我国建筑设计面临的挑战具有一定意义。

一、时代背景

吕彦直在 1914 年进入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学习, 于 1921 年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 后来主持了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杨廷宝、梁思成分别于 1921 年、1924 年赴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 并于 1927 年、1928 年相继归国。杨廷宝和梁思成在校期间与回国之后都是维持着挚友关系。三位先生在从事专业的建筑设计工作之前, 都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 在国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为日后在建筑设计实践中处理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关

系的问题上提供了思路价值和知识储备。

1927 年发布的《首都计划》(THE CITY PLAN OF NANKING) 意图对南京进行现代化城市改造。该计划正式提出了“中国固有式建筑”这一概念, 即“西方建筑技术手段, 同时又具有中国传统官式建筑的某些形式特征与视觉效果的中国近代建筑”^[1]。在此号召下, 众多的古典复兴形式建筑问世。在 1930 年前后, 我国也有一些建筑师进行了创新性的建筑设计创作, 他们的创作大多是有着明确中国传统风格元素的现代建筑, 从另一个方面展开了对“中国固有式”建筑的探索与研究^[2]。

二、建筑实践作品

在吕彦直、杨廷宝与梁思成等建筑师在 20 世纪初期创作的建筑实践作品中, 基本做到了延续“构图一要素”设计思想的同时, 对中国建筑风格现代化建筑进行探索的时代任务。通过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创作, 将建筑比例与建筑审美融入中国官式建筑语言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近代建筑, 这和近代历史文化街区中因被殖民产生的建筑具有较大区别^[3]。

(一) 广州中山纪念堂(吕彦直)

吕彦直生于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 在 1929 年因修筑中山陵积劳病故, 年仅 36 岁。吕彦直在短暂而又辉煌的生命中, 留下了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这两个凸显着时代特色的建筑作品。

广州是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活动的主要策源地, 1925 年 4 月 13 日胡汉民在发表的《致海外

同志书》中明确地提出了要在广州筹建中山纪念堂的计划，他以“以伟大之建筑，作永久之纪念”号召广大人民积极参与^[4]。此前，吕彦直已经在南京中山陵的设计竞赛中获得头奖，在1926年，他又积极地投入导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创作工作中。吕彦直认为，两处纪念建筑虽相隔甚远且功能不同，但在形式与精神上应保持好连贯性，新的纪念堂同样要体现民族精神，共同纪念孙中山先生。^[5]因此，在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中，吕彦直仍然延续了以现代材料与结构建造中式建筑的总体建筑方式，采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中国民族形式的纪念建筑。

近年来，国内学者就广州中山纪念堂形制探源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本文认为，中山纪念堂形制的来源即为中国古代礼制建筑中的明堂建筑——这也是目前被学界广泛接受的结论之一。

广州中山纪念堂宫殿形制的来源，相关研究在结论上有宋代与清代的分歧。本文认为，根据吕彦直的教育背景和从业经历，宋代宫殿建筑法式的来源更为可靠。同时，在纪念堂八角形会场的设计上也能发现“希腊十字”对平面构图的影响，这正是吕彦直受古典主义建筑训练的结果，符合其既往手稿的建筑创作风格。

在立面形式上，中山纪念堂延续了中国官式建筑的立面构图形式。有所差别的是，吕彦直将原本的“三分法”改为了新的“五分法”，自上而下依次为：八角形攒尖屋顶、八角形屋身、抱厦歇山顶、抱厦歇山屋身、纪念堂台基。^[6]从建设年代的使用习惯和使用情境出发进行讨论，本文认为，这样的改进很可能是由于其功能的需求，即举办讲演活动对建筑空间有所要求。在与晋祠圣母殿的对比可以看出，立面开间上吕彦直也采用了传统开间的不等宽规律进行布置——明间最大，开间沿中间对称分布。在这样的思路下，配合精巧的细部设计，传统建筑的精神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山纪念堂的立面设计，集中体现出了当时中国的建筑师对传统建筑的模仿与重组。但如果探究该建筑在立面上的比例规律，则古典主义几何构图设计手法也将通过经典的构图比例和特色的建筑形式体现了出来。中山纪念堂的立面为对称构图，形成了2:3的黄金比例构图，大部分构图的交点与重点部分被纳

入以底边的中心为圆心的半圆中，体现出古典主义的秩序与美感，反映了设计时清晰的逻辑。

（二）东北大学图书馆（杨廷宝）

沈阳的东北大学始建于1926年，从校区总平面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现代大学规划的形制即为中轴线布局。图书馆的位于中轴线上，与教学区建筑的外形保持一致，运用了都铎哥特式风格的建筑外形^[7]。与古典形式相比，其处理方式更加灵活、简洁，并且高度符合了我国当时的建筑材料供给和施工技术条件^[8]。

从图书馆的主立面采用三段式构图，三个部分的比例为1:1:1，两端为水平完整的形式，强调了建筑的体量，中部入口从水平线中突出来，且其组成多为垂直线，将其平均分为五个部分，虚实得当，体现出一种挺拔的姿态。在水平划分上，根据女儿墙、主体与基底也被划分为三个部分，与我国传统的“三分法”相似，体现了较为明确的我国官式建筑语言。

在内部空间的设计上，主要阅览室被设置为拱形空间，不仅满足了阅览空间大跨度的需求，还增加了内部采光与通风，同时内部的空间形制被投射到立面上，在主立面的入口处形成了弧线的构图，与其他的开窗及入口形式相呼应，完善了立面的结构。两端藏书和办公的功能在立面上得到了反应，一句其功能与结构进行了合理的窗洞设计，两层间窗洞选择黄金比例的矩形。每扇窗皆为相似的矩形或正方形，通过规律的分布，明确地体现出了古典主义建筑的秩序感。

东北大学图书馆是我国近代大学图书馆中的经典作品，丰富了中国近代建筑的形式与种类，在中国建筑史的发展上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该建筑对于立面的处理和功能形式的组织，充分体现了杨廷宝成熟的建筑设计能力，成为外部形式与内部功能空间组织联合表达的典范。

（三）北京仁立地毯公司铺面改造工程（梁思成）

自1920年起，梁思成对我国现代建筑的开拓和探索主要集中在二十余项建筑设计作品中，展现出“新而中”的特点，其中以“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北京仁立地毯公司铺面改造工程为代表作品。该项目于1932年建成（现已拆毁），位于王府井商业街上临街的位置，主立面面向街道，对于展示整个建筑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该工程属于装修设计而非建筑设计且体量较小，但本文认为，

它已经体现出了梁思成高超的建筑设计手法，反映出他对传统建筑形态和现代化使用功能的协调处理能力趋于成熟。

建筑在立面的处理上，中间部分的玻璃窗户形成了立面上“虚”的部分，与两侧的立面形式形成虚实对比，同时形成了横向分割，将建筑分成三个部分。窗户的尺寸与建筑的体量相比，带来了通透感，形成了建筑简洁明快的现代感。在立面的装饰上，窗间墙立柱顶头做了梁头的处理，并且在底层橱窗的立柱上做了斗拱装饰，另外加了青砖、假石等传统建筑装饰，丰满了建筑细部。在建筑屋顶线条的处理上，设置了吻兽，并利用女儿墙的高低变化进行丰富。

虽然立面设计时使用了较多装饰，但是梁思成在处理时重点关注各类元素在现代建筑中的协调，同时以分割的手法突出了重点，体现出建筑师对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的深刻理解。

三、创作理念

在建筑创作理念上，三位建筑师都是遵循“构图一要素”的设计原则，都采用了在现代建筑基础上采用中国传统官式建筑语言的手法，通过运用如大屋顶、斗拱、“三分法”等手段，探索将民族风格与现代建筑结合起来。

吕彦直是我国首位采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建筑师。他大胆运用现代材料建造中式建筑，在中国建筑的形式上进行探索，实现了开拓。在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中，他根据功能对传统形式进行了改进，让建筑空间更符合讲演功能的需要。

杨廷宝不仅在建筑形式中尝试延续中国历史特点，还主张民族建筑风格的多元化，并在多个建筑作品中进行不同风格的尝试。如他将都铎哥特式风格应用于东北大学图书馆，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扩建工程中采用了罗马式建筑风格^[7]等。

梁思成的建筑理论高于其建筑设计方面的成就，他是第一个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者，开拓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道路。正是由于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透彻研究，因此才能在众多繁杂的建筑表达形式内探索出一条协调的路径，使建筑设计方案协调美观。

四、思考与结语

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面临的是建筑中现代与传统关系的问题，他们探索在民族风格和现代建筑的矛盾

中，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开拓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9]，在三位大师的作品和创作理念中都体现了弘扬传统文化使命：他们不仅在完成作为建筑师的使命，更是将自己的职业理想转化成文化使命，为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的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命题的演绎。

虽然时代不断发展，但“民族风格与现代建筑”的议题一直是我国建筑师面临的重大命题。近年来，很多以体现传统文化为名的“丑建筑”与新的“古建筑”千夫所指，影响了建筑设计的发展，也对建筑师们做了警示。在建筑实践作品中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的智慧与哲学是当下建筑师的高级追求。三位大师开拓中国现代建筑所做的工作，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遗产。这些遗产常温常新，不断启发着现代建筑师完成自己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 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等. 首都计划 [M]. 南京出版社, 2006.
- [2] 邹德侬. 中国建筑史图说 - 现代卷 [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 [3] 刘家韦华. 近代历史文化街区地下空间可实施存量评估方法 [D]. 河北工程大学, 2019.
- [4] 黄丹彤. 西式会堂“译”出中国气派 [N]. 广州日报, 2015-05-13.
- [5] 赵雅芝. 吕彦直建筑实践及理念探析 [D]. 山西大学, 2018.
- [6] 刘丹枫, 程建军. 中山纪念堂：一座中国固有式建筑的重读与解析 [J]. 南方建筑, 2016 (05) : 102-109.
- [7] 陈志华. 外国建筑史 [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 [8] 杨廷宝等. 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 [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3.
- [9]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2.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华商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科研项目 (2023YF13) 资助。

作者简介：李丹 (1979—)，女，汉族，辽宁沈阳人，高级工程师，本科。